

司馬遷的世界（下）

華生著，張端穗譯

隨著我們上述的謹嚴的封建制度的崩潰，出現了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新的機會開展在人們眼前，不論出身，誰都可以依據他們自己的才能而在這個世界取得一席之地。這群新起的士人家臣階級最常堅持的一項原則自然是：才能，而非出身，成就一個人的名望。這個觀念，雖然在論語上只是略微提及，成為日後儒家基本信條之一。禮記說：「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註12）。荀子更直接：「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董仲舒將此原則推廣到甚至包括了天子：「天子不能奉天命則廢而稱公」（註14）。是這個觀念鼓舞了農民陳涉領導起義抗秦，他勇敢地宣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陳涉世家）。高祖及其隨從，從社會的最低層中躍升為帝國的統治者，這證明了統治權必然與生俱來一事已是過往塵煙。

但是，如果一個人能夠藉著運氣及自己的努力迅速崛起，他也可能同樣地迅速失勢—當他的運氣轉變時。縱橫家們特別是常為求得君主的寵幸而從事激烈的競爭；並且，如果勝利的一方是贏得了財富及榮耀，失敗的一方就面臨了放逐或死刑。如同一位食客酸楚地道出：「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伍子胥列傳）。因此，如果人們對迅速成功的可能性保持樂觀，他們也會為成功可以同樣迅速地變成失敗，勳望可以同樣迅速地變成羞辱及刑戮，這一景象而感到寒心。身世獲得高位的觀念既已遭到摧毀，晚周及漢初社會的新領導群發現他們不再必然能為子孫保住他們辛勤的成果。一位食客在周朝即將結束時勸諭道：「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史記白起列傳）選擇文職生涯的人也同樣地發現，由於君王的喜怒無常以及朝廷中敵黨的不斷的陰謀，他們也永不能確定何時會失勢。司馬遷，他知道朝廷官吏間相鬥的內情，寫道：「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扁鵲列傳）

這種敵對、懷疑的氣氛，命運戲劇性起伏的氣氛，孕育了一種深刻的疑惑及絕望的情緒，而瀰漫於本時期的文學作品之中。隨著舊有宗教信仰的衰亡，人們喪失了他們對一本質上為和諧和仁慈的宇宙的信仰。像古希臘時代的希臘人一般，中國人愈來愈傾向把他們自己看作是一盲目無常的命運的玩物，他們隨時都會被此命運擊倒。如淮南子所述：「夫歷陽之都

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倣真訓）

屈原、他的追隨者以及漢初的詩人，他們的詩都強調了人類命運的無常與人生可悲的短促。爲了尋求解脫，有些詩人企圖棄絕這個世界及其紛爭，鼓吹道家回歸神秘的靜謐之中的觀念；其他的只是勸喻世人，在還有時間及能力之時，飲酒狂歡，盡其所有行樂。但有一件事他們全都肯定：人間沒有不變之事，只有興衰的永恒循環，除了死亡日近之外，沒有一事是肯定的。

秦統一中國，以及這新王朝所採取的許多革命性的措施，如廢除封建制度，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書寫系統的標準化，完成萬里長城、焚書等，這些都是人人皆知之事，不必在此重述。然而，有一點我必須強調。秦代是漢人所憎惡的朝代，它是暴政、壓制、倨傲及不合時宜的化身。雖然漢朝君王利用了許多秦代建設的利益；並且暗地裏繼續遵循許多秦代的原則及措施，但他們在公開時則宣稱自己至死不渝是秦政的反對者。他們是將全國從暴政中拯救出來的救星；他們是夭折的周代命運的贖救人。」（註15。）另一方面儒家信徒，因爲在秦代思想控制的企圖中受害最大，所以特別地爭相在命運悲慘的秦朝之上堆積辱罵之辭，以致於司馬遷不得不提醒他的讀者：在秦始皇帝惡魔似的狂暴之後，潛藏著秦代祖先好幾百年聰慧以及甚至有時是仁慈的治蹟。

中國的統一，封建制度的廢除，秦時人口大量的遷移以及隨同秦代覆亡而來的慘烈戰爭及社會動亂，都象徵了周代舊有的封建貴族的最後絕滅。隨之而起的漢代世界則幾乎全是由社會新階層中崛起的新人所構成的世界。新政權的領導人物之一，張良是先秦諸侯國家之一的宰相世家的後裔，而其他少數幾個是秦代的小吏。但是其餘的，包括成爲新朝代皇帝及皇后的一對，都是出身最低微的平民——幾位農氓，一位屠狗者，一位包工，一位絲販，一位車夫等。他們既無顯赫的身世、又無淵博的學識來爭取人心，但他們憑藉他們的識見、勇氣以及敏銳的自然智慧，崛升到世界統治者的地位。就我們所知，漢王室出身卑微的事實，在中國歷史上是新而無前例的，並且，如果我們要了解這一新時代的氣質，我們必須時刻在心頭提醒自己這一事實。

我們上面已談及司馬遷刻劃中國最早三個朝代的善惡之質的方法：夏的忠及忠的墮落——野，商的敬及其墮落——鬼，以及周的文及其墮落——僂。據司馬遷說，這樣的循環完成後它必重新開始。秦之敗亡是因爲它未曾掃除周朝腐化之後的「僂」，而後只是附加上秦本身嚴厲苛刻的法律。但漢朝聰明地回歸到夏的“忠”。

我相信，司馬遷在此所提及的是顯示漢初統治者及其統治特質的粗野而懇切單純的態度。高祖及其追隨者曾是秦代的平民，他們知道平民怎麼在秦律下受苦。因此，他們能夠拋棄那些最侵擾人民的法律，同時保存秦代行政系統中的優點。他們爲全國帶來六七十年比較自由的

時光，不虞內亂及外患，以及節儉放任的統治，因此帝國這樣恢復了、繁榮了。到了司馬遷出生之時，人民已過著相當安逸富庶的生活，政府金庫滿溢。

但是這種大部份是根據道家無為理想而建立的消極型態的統治不能永久持續下去。許多漢代統治者遲早必須面對的問題都有待更積極的行動來解決。其中之一是漢朝與外族—特別是和北邊的匈奴的關係問題。匈奴對中國的和平構成長期的威脅。在漢初他們常對帝國內部進行破壞性的襲擊，幾乎馳入京城本身。除此而外，他們沒有適當地對漢代統治者表示臣屬及效忠之意，而這是中國傳統要求蠻夷之邦所做的；相反的，漢朝發現它處於必須向匈奴進貢以換得和平的境地。這些野蠻人對漢王室的尊嚴毫無知覺，以致喪偶的匈奴單于膽敢在高祖死後遺書給呂后。信中建議，因為他倆都已年老而且孤獨，他們應該成親。呂后對此感到十分憤怒，但她也無力採取任何行動，只能回函婉拒。

第二個問題是漢朝貴族勢力日漸壯大。高祖恢復了秦所廢除的封建制度，將封土賞賜給他的夥伴及親族。自始前者就命運多舛。那些在高祖崛起時與他並肩作戰的人們，當高祖即帝位後，很難接受一樁事實：他不再是戰友，而是他們的君王。他們之中有些因戰利品分配不公而憤怒，有些夢想推翻現狀，取代老長官，自立為王。高祖對這些人產生懷疑，對他們的忠貞不放心。呂后甚至更是疑心重重。雙方的猜疑與恐懼日漸加深，最後這些新封建貴族中的七位（五王二侯），有的叛變，有的因有叛變之嫌而垮臺。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被擊破，被逼自殺或逃到匈奴之域去。到文帝統治時，這些不屬於劉家的一被稱為「異姓貴族」的一在政治上已沒有任何重要地位。但劉姓貴族命運較佳，有些墮落而無能，但另有許多治理他們的領土，又聰慧又適宜，因此他們的力量與獨立性逐漸增強。不久漢王室就明瞭，這些人對中央朝廷的權威形成了一個持續的威脅。

漢朝政府面對的第三個問題是放任政策的直接結果。因為秦朝的壓迫與苛政，令全國人民十分憤怒，漢初的君王相較之下極為小心地保持刑法的簡單，並且儘可能地不干涉人民生活。雖然這個政策有許多好處，但它也導致許多動亂與胡作非為之產生，在偏遠的省分特別是如此。就像後來中國歷史中常發生的，地方山頭在鄉間出現，他們自己擁立自己，成為地方上的實質統治者。他們像舊封建諸侯一般，維持自己的門客以貫徹他們的意志。

除此而外，有力量的地主與商人，因國家的太平與繁榮而致富，開始經常侵佔貧民的土地和權力，迫使小農負債，成為農奴，而攫取他們的土地以形成大莊園。

第四個問題，與上述的不同，與其說是和新王朝的物質生活有關，不如說是和新王朝的精神有關。當時在知識階層中瀰漫一股情緒，覺得漢王室缺少尊嚴。漢朝君王及其臣子，想想他們卑微的出身，無怪乎會被人認為他們是群粗漢。高祖以他粗野無禮的態度而出名。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從一位儒生頭上摘下帽子，並在上面洒尿，以表明他對他的看法。另一方面，當他即帝位後他卻又抱怨他的隨從終日在宮庭裏痛飲喧鬧，用刀劍砍劈庭柱。呂后以不人道的殘忍著稱。惠帝死於放蕩淫樂。景帝還是太子時，曾一怒用棋盤打中他遠房堂兄弟—吳太子—的頭上而

殺了他。因而很自然的，朝廷中一些較敏感的學者與士人覺得應該採取行動，使王室具備較尊貴、較典範的格調。

同時有人也覺得，雖然朝廷迄今為止仍一直採用了許多秦朝的制度，但也應該更凸顯漢朝是一個新朝代、與前代無關這一事實。學者認為，這種獨特性質應該藉著一些傳統認為一個新朝代所應有的舉動而彰顯，如：改歲首、易服色、（自五行中）選帝德、實行封禪禮等，以為天命在漢室之象徵。

這些問題都在漢朝第四代君王—文帝治下有所討論。但文帝是一個在中國及日本歷史中受人尊敬的典型皇帝—他無為而治，只關心和平與儉約。他生活在樸素的宮殿裏，讓他的皇后穿著簡樸，同時他常下詔罪己，要求臣民指摘他的過錯。文帝之治，非常成功，帶給人民太平及比較安適的生活。因此班固及後代史家稱贊他是漢室中最偉大的皇帝。但這個榮譽之獲得有其代價的。文帝對中央政府面臨的緊急問題，幾乎不會提出任何解決之道；他只閃避這些問題。

繼立的景帝企圖採取較積極的行動。他採取嚴峻的手法來消滅地方上的不法行為，獲得相當的成果。他也企圖抑止王室貴族的勢力，但他在此的努力只激起了最強大的七個封建王國的叛變。這場叛亂雖然很快就被平服，但它的爆發戲劇性地顯示了時機已是多麼晚了。

公元前一四〇年，司馬遷出生後五年，新君王武帝即位，他懷著與日俱增的精力與勇氣，著手解決帝國面臨的問題。他的政策十分積極，與他前任消極性的統治正相反。他的統治象徵了漢朝歷史的一個新紀元。許多成為漢朝之後朝代特徵的政策與制度都在他手中創立。同時許多晚周及漢初的理想也在他治下遭到扼殺。

武帝了解，他對於漢室與匈奴的關係必須有所作為。他的解決之道是先沿北邊設置一連串的堅強防線。而後他對此又感到不滿，將戰爭擴展到敵人領土的深處。雖然他從未完全征服飄忽不定的遊牧民族。但他採取了許多措施來確立漢朝的聲威，並且至少為他的後繼者保證了一些安定。除此而外，經由戰爭與探險，他將帝國的領土擴張到高麗境內，到東南、西南以及西部，使得漢帝國首次直接與中亞的土地相接觸。

他承襲景帝之政策，繼續努力粉碎封建諸侯的勢力。他強迫諸侯將封土分給子孫，他派遣間諜及監察到各封建朝廷去，藉著一些瑣碎的罪行而整肅他們，他逼使他們破產或直接攫取他們的土地。他的成就驚人，在他治下，漢貴族不再成為中央政府的威脅。他也增加了地方行政官員的人數，增強他們的行政效率。他鎮壓盜賊、地方土豪，大大地加強了法律的複雜性與嚴苛性。同時對那些因先帝的放任政策而致富的大商人，他也努力消除他們的勢力。

最後，武帝以驚人的精力從事宣揚漢朝聲威的工作。他改曆法、易服色、以土為漢朝帝德，同時舉行封禪禮。他在長安建築了華麗的宮庭、高臺，以及廣大的帝苑。這些建築震懾了漢朝子民及朝貢使臣的眼睛。他經常巡行全國各地，讓人民得以瞻仰他的風采，同時他也得以沿

途祭祀山川諸神。因為他最推崇儒術，超過其他各家思想，他逐步推廣經典的研究，並且以儒家思想為朝廷正統思想。對武帝時代的許多人而言，當他們看到經典中記載的古代禮儀又見興盛、中國君王的德性恩惠又流傳到子民身上，更越過邊境四及未開化的蠻夷之邦，而上天又將降下贊許的祥兆，他們必定開始覺得黃金時代已經來臨。

但是，像武帝所追尋的這樣一個強力的政策必然引起社會中許多團體的反對。漢初的人，十分明白，中國只有在一個王朝下統一，才能免除內憂外患的雙重厄運。然而他們對秦短暫統一下的殘酷的集權主義心懷戒懼。文帝的仁政，使得人民有充裕的空間施展個人的自由，但如此也危險地減弱了全國的力量與統一。另一方面，因為武帝一心想加強及擴張國勢，將所有權力集中於一己之手，因而顯得無情地忽視個人的權利與自由。這些舉措都激起人們對暴秦的回憶。當時像司馬遷這樣的思想家所顧念的主要問題是：在追求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這兩個明顯地互相矛盾的意願之間，怎樣能達成一個適當的平衡，平衡點又何在？這個曾經困擾並且繼續困擾任何時地政治理論家的問題，對當代的思想家而言是更形尖銳，因為他們目睹在武帝統治下的數十年間，政策由一極端的不平衡急遽地轉變到另一極端的不平衡。（註16。）

漢朝政府準備修築一條從中國由蜀地以通西方的道路，蜀地父老群起反對。宮廷詩人司馬相如在一篇檄文中曉諭這些父老們，武帝是非常之人，他的所為也是非常之事，必然會為人民所誤解與恐懼。（註17。）一般人民不歡迎武帝的許多政策是很明顯的，但不只是他們在抱怨。十分有趣的是，儒生在許多問題上，與贊助他們的君王起衝突（註18.）。首先是對匈奴戰爭的問題。儒家贊成將中國文化的福祉散佈到外地以及宣揚漢朝的聲威。但對外戰爭及擴張的結果是在人員及金錢方面太過浪費，損害重大。賦稅和軍役加諸人民的負擔不斷地加重。與西方部落的接觸開拓了一個新的有生氣的貿易，但中國絲流出，換回的只不過是玉石及異國的水果—都是些註定僅能供給富人享樂的奢侈品。因此不久，儒生就呼號採取和平與孤立主義的政策，以使國家經濟的健康得以恢復。

武帝為了支持對外戰爭以及日漸奢靡的帝王生活，不得不尋找新的財源。一項由從前延續至今的權宜之策是犯人得以支付巨額罰金獲得帝王之減刑。另一項是將朝廷中名譽性的職稱出售。但僅僅這些仍不足夠，政府決定從事商工業。政府從民間商人或地方封建領主的手中接管了鹽、鐵及其他的專賣事業，並開始作穀類期貨及貨物輸送的投機生意。從這些以及其他舉動上看來，政府實際上是在遵循法家的理論；並且為了經營這些新企業，武帝選用了公開宣揚法家思想的民間商人。儒生對暴秦的思想再度出現感到震驚。他們堅持政府應該關心更高遠的理想，而非利益的追求。他們抱怨，政府對全國經濟生活過度的干預，對人民只意味更差的貨品，不良的行政與壓迫。

儒者們曾建議武帝設置選拔及擢升政府官員的考試制度。這是有名的中國科舉制度的開端。但是，雖然武帝實現了這個制度，他主要是利用它來選拔意志薄弱、語調柔媚的奉承者，充

塞政府各職。他賣官鬻爵導致貴族階級制度的混亂。刑法的複雜與嚴苛使得一位官員所能做的就是避免入獄。史記中記載（卷三十），一位朝廷官員聽到一項政府新政策，「微反脣」，便被控訴為「腹誹」。我們只要談到這個故事，便可了解武帝的施政與儒家的理想—帝王接納朝臣的直言極諫的理想—相距有多遠。

最後，儒者對武帝處理宗教事務，特別是封禪典禮的方式，感到不滿。武帝雖然自稱信奉儒家思想，但卻在身邊聚集了一群巫士。他們企圖為他召喚逝者的靈魂或為他保證不朽的生命。在實行封禪禮時，他捨棄了混亂而自相矛盾的儒生的建議，自行設計了他自己的禮儀。結果封禪禮不再是君王個人對不朽生命的秘密追尋。

司馬遷的生平提供了不少這時期的消息。他是武帝的政策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身為朝官，一生侍奉皇帝，他是當時知道真象的少數人之一。常有人說他對武帝加諸於他身上（因他太直言極諫）的腐刑深以為恥，因而背叛了武帝，寫了史書作為對當代嚴苛的譴責。當然，這種可怕的刑罰的確使這位不幸者的恥辱與憤怒加深了不少。但這並不是他寫歷史書的動因，因為他在受刑前已開始著手寫史；他的不幸也不是他反對武帝及其他統治的唯一原因。

像儒者一樣，他反對武帝的外交政策和實行這種外交政策國家的健康所須付出的可怕代價。他是個開明、理性的人，他憎惡巫士說服武帝去接納的大迷信。他反對政府專賣與投機事業，他的理由與儒者相同—因為逐利不是君王所適宜的，同時這些活動帶給人民痛苦。身為經濟放任政策的支持者，他對陷國家經濟於混亂、毀滅商人階級的法家政策持否定態度。有這麼多的官員—包括他自己—在嚴苛的刑法下戰慄、受罰，他對此感到憤怒與哀傷。

有人說司馬遷是道家者流，因此他是站在教義基礎上反對儒家的皇帝，這個同情道家的古老指控已被人太過誇大與誤解。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公開贊同道家思想，貶抑其他學派，但司馬遷本人從未作過這樣清楚的聲明—特別贊同某一派學說。身為當時最有學問的人之一，他熟悉所有學派의思想和著作。無疑地，他在這些著作中都發現一些長處，但他最崇高的敬意似乎一直總是保留給孔子、儒家經典以及儒家學說中最優良的部份。他曾嚴苛地批評在武帝時成為高官的儒者公孫弘，這是事實。但這並不因為公孫弘是儒者，而是因為他諂媚武帝，治理政事時又極為嚴苛殘酷。公孫弘以直言批評對匈奴之役開始他仕宦生涯，但他一察覺到武帝心意所在，就立刻收回己見，轉而讚成這些戰役。司馬遷是因為人格原因，不是因為學說衝突，而貶抑公孫弘及其同類，這類人在意志堅強的武帝朝中日益增多。

但司馬遷對當代所抱的幻滅感，比對特定的政府政策的懷疑感更要深刻。他是位對過去滿懷熱愛與同情的歷史家。並且他非常敏銳地覺察，在他一生所發生的變化中，許多他最讚揚的古代理想已經死亡。他懷念晚周及漢初的日子，當時人人可以憑本身的才能崛起，躍升至最高地位。他讚揚粗略而切合實際需要的方法，君臣之間的忠誠與友誼，過去政治顧問及理論家的直言無諱，以及偉大將領樂於與士卒同甘共苦的精神。他是個英雄崇拜者，大半生涯却用

用在描述過去的英雄事蹟，而在他的時代裏，他見到古代的自由、過去個人的忠誠等都在受到一日漸龐大的官僚機構及一套嚴密瑣細的法律所壓抑。他對當代的幻滅以及他對已消逝過去的懷念都以無限苦澀微妙的型式出現在他的史書中。他寫了兩篇相關的文章，分別題為「循吏列傳」（卷一一九）及「酷吏列傳」（卷一二二）。前者介紹周朝封建諸國中的名臣；後者完全描述漢景帝及武帝兩朝中的官吏。以此他證明前代的人曉得怎樣執法與維持秩序，而不必屈流於過度的嚴苛殘酷。他寫了另外一篇文字—「遊俠列傳」（卷一二四）在其中他讚揚了那些在漢初郡國中實際掌握統治數的地方「土豪」。他直率地承認這些人有他們的缺點，他們的生涯常因不法與暴力而顯瑕疵，但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實踐者昔日理想的最後呈現—他們忠於朋友、信守諾言、勇於濟助弱小及貧困。在另一篇文字（卷一二九）中，他致力描繪過去的大資本家，因為他認為商業上的成功是種人類智巧、想像力和自由的顯現，雖然在他眼中，這並不是一種很有價值的顯現。在另一章中，他極力贊揚李廣，因他能與士卒同甘苦，並且他雖粗魯木訥，卻以一身之行事，贏得國人敬愛（一〇九卷十頁及二十一頁）。與李廣相對照的是武帝的兩位愛將—從不曾為國人贊揚的衛青和置部下饑餓不顧而仍穿域蹋鞠自娛的霍去病（史記卷四、一一頁卅一）。在某種意義上說司馬遷是個浪漫而保守的人，他像許多歷史家一樣，生活在過去之中，看不出古代個人自由的理想、古代個人忠貞的俠士風範，在複雜的官僚制度治理下的偉大統一帝國中已無法存留。像武帝所主持的政府是不能容忍過去放任的政策再存在；國家在面臨內憂或外患時再也不能示弱。中央政府需要強化，地方行政必須強固，帝國的尊嚴必須加以維護。武帝有眼光以及決心來實踐上述目標，即令遭受嚴厲批評亦在所不惜。如果不是他曾強固了漢朝的力量，漢朝的命運就難以預料，但對一位了解並讚揚一個即將結束的時代的人而言，活在當世就不是件愉快的事了。司馬遷就是如此，在武帝治下，許多好的事被完成了，但許多好的事也被摧毀了。司馬遷眼中所見到的只是毀滅而非建設的那一部份。

在這篇導論中，我的目的是簡短地描述史記所記載的時代中的一些特徵。史記止於武帝朝，我的敘述也止於此，似是合宜的。但過去人們常將司馬遷的作品與他的偉大繼承者班固的作品漢書相提並論，因此值得我們再往前一步，看看班固的時代是怎樣的情形，並且與司馬遷的時代有何不同。

武帝逝後，幾乎有一世紀之久，漢朝的統治繼續延續下去，沒有遭到任何大規模的內憂外患。但劉氏君王逐漸衰弱與無能，因此在公元後九年大司馬王莽得以在無對抗的局面下篡漢，自立為帝，建立新朝。然而他的成功只不過是曇花一現，公元後廿五年，叛變爆發，王莽身死異手，劉氏復位。漢室新生，將都城由長安遷至東邊的洛陽，史稱東漢。班固生於公元後卅二年，東漢第一位皇帝（光武帝）朝。他的大半生擔任官方作家與史官之職務。其到公元九十二年逝世為止。

新的漢室在許多方面與前漢室不同。前漢的君王有許多類似暴發戶的習氣。君王們粗鄙、

缺乏教養，后妃們過去常是獲得君王寵幸的舞女。皇室保存了許多前代混亂時期的理想與態度——即敏捷、行動、勇敢和機智，而非教養、學問是主宰成功的條件。特別是從武帝時代起，漢室喜好狀麗的展現、雄偉的宮室、奢侈的享受。這個時代揚溢著一種粗野、生氣勃勃、俗麗的氣氛。

我們已提及武帝時開始產生的變化。這種改變的全部影響最可由後漢的生活與精神所提供的對比看出。武帝定儒家思想為國家的教義，並且為學者們開啓了經由考試進入仕途的門徑。後漢大多數的官職由學有成就者獲致。因此學術研究，特別是儒家學術的研究變成上層社會份子所關心之事，即使帝王及后妃也是經典研究的學生。商人階級在前漢開始變得強大與重要，這時幾乎降為隸民的地位；擁有土地的士紳——知識份子——成為社會上不容置疑的領導者。這批新起的社會中的支配者反對粗鄙及暴力、競爭及俗麗的表現。他們回顧到周朝初年的理想時代，當時社會太平，有德行、有學問的君王奉行那些反映社會階層區分的高雅的儀節。後漢的新興階層努力在他們的時代裏重建這種理想。

漢書很清楚地反映了班固及其時代中這種將古代理想化的狀況以及正統儒家思想的內涵。除此而外，班固寫了一篇長賦——兩都賦（漢書卷一百、文選卷一），在其中他將西漢長安的俗麗和洛陽寧靜的優雅、高尚的儉素作了一番比較。

從他們各自時代的這些差異看來，班固並未全盤贊同他的前輩司馬遷的作品，是不足為奇的。班固和他的父親班彪都臚列了他們各自對史記的批評。他們對司馬遷利用儒家經典作為史料的方式——改寫、裁剪、移動材料以適合他的敘述——大起反感。他們反對司馬遷給予陳勝、吳廣這類軍事上崛起者太大的份量。因為這二人的權力從未獲得正式認可。他們對司馬遷為遊俠所作的辯護，感到痛惜，這些人對他們而言只不過是邪惡的法外之徒；他們同時發現司馬遷重視可鄙的商人階層之事是不可原諒的。他們也是最先指稱司馬遷是道家者流的人士之一。

我在這兒提及這些批評，不只是因為他們代表了最早主要批評史記的人的意見，也因為它們代表了此後二千年大多數閱讀史記的讀者的心聲。因為士紳的影響繼續支配著中國社會，很少中斷，直到一九一一年革命為止；而後漢這些人的態度也多多少少代表了後來世代中國學者的態度。中國人一再閱讀、研究並讚揚史記。但只有極少數有非凡想像力的批評家，能超越當代的理想，回顧到這些理想尚未成形時的司馬遷的時代，去了解、同情司馬遷的心聲。我們現在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古代中國——儒家文人的中國——的觀念與假設再也不具有它往昔的支配力。因此，這是一個適當的時機，我們可以用一個新穎，並且較不具成見的眼光來審視司馬遷和他的作品。

脚注：

12.禮記，郊特性篇。

13.荀子，王制篇。

14.春秋繁露，卷十五。

15.見侍中吾丘壽王在所謂的周鼎出現時對武帝說的話：「今漢自高祖繼周…。」（漢書卷六十四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16.即使今天這個問題仍未獲得解決的程度有多大，可由新共黨政權中的一位作家最近對司馬遷所作的詮釋中生動地看出。這位作家先讚揚司馬遷，因為他支持人民有權反抗漢武帝統治的壓榨和殘暴，而後又譴責他，因為他只看到武帝政策的黑暗面，沒有察覺武帝的對外戰爭及領土擴充為中國帶來力量和榮耀。見李鎮淮，司馬遷，頁九十一九四及第三章。

17.「難蜀父老」（史記卷一一七；文選卷四十四）。司馬相如的這篇宣言是漢朝修辭學極為特出的例證，內容是詳述帝國聲威擴展到國境之外的理想。它以對武帝這位非常之人詩般的描述結尾，武帝像是焦鷗明飛翔在懵懂無知的群眾之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鷗明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戴澤。」

18.關於武帝及其後繼者的經濟政策內容，以及儒生對這些政策的反對意見最可見於鹽鐵論一書。雖然這本書是緣於一項會議的討論而寫成，而此會議直到昭帝即位六年時（公元前八一年）始舉行，並且這本書又是桓寬在幾十年之後才寫成，但與史記後期篇章作比較顯示鹽鐵論基本上代表了武帝經濟方面的顧問私儒家反對者之間的辯論。

譯註：本文出自 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一書第一章。
 本章上半段譯文見中文學報第四期頁 1 - 13。

